

继往开来, 进向中国

社会学的新纪元

——“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纪要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于1991年11月6日邀集在京的社会学界科研、教学及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近30人,召开了题为“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社会学研究》主编张琢首先说明了召开会议的主旨。他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讲“群学”到今年已经一个世纪了,中国的这一百年可谓激荡的一百年。从康有为讲学以后就发生了“戊戌变法”,接着是“义和团运动”,清朝的“新政”,再接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风风雨雨:土改、抗美援朝(国内同时“镇反”)、国民经济恢复,1956年前进行比较顺利,1957年反右,58年起三面红旗运动,59年反右倾,接着进入经济困难时期,62年以后有所发展,66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粉碎“四人帮”,经过两年过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的发展环境,取得了长足的顺利的发展。我们社会学也是在改革开放中重新恢复的。社会学跟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经过了很曲折的发展道路。我们今天的会议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回忆一下社会学的百年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商讨我们的社会学如何发展,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有一个目的:我们想借这个光,在坐的各位都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热情作者、读者,对我们的刊物如何办好请提出宝贵的意见。

张琢发言后与会者踊跃发言,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及社会学事业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休戚与共,伴随着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社会学迎来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黄金时代。

韩明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在社会学百年纪念的时候召开这个座谈会很有意义。中国社会学学历尽坎坷,是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中国人民历经的曲曲折折的过程相一致的。社会学的发展史也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时代的反映。从康有为讲授“群学”至今已有一百年了,中国真正有社会学也就是从“五四”前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应该说我们的先哲前贤在那里鼓动,他们是社会学的先行者。1949年到1952年教育系统进行了院系调整,社会学系就被逐步取消了,从1952年起大专院校里就没有社会学系了,当时最后一批学社会学的就是1952年的毕业生。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派运动,所有搞社会学的人们的工作也都停止了。到恢复重建社会学中间经历了27年的停顿。社会需要是社会学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当时人口问题已经成了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科学院得到了中宣部的指示,打算成立一个人口研究所,找到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来召集座谈会,看看在中国科学院能不能建一个人口研究所。座谈了三次,反右派就开始了,凡是参加了这次座

谈会的包括费孝通先生、袁方先生在内一律成了右派。改革开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79年召开的座谈会上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为社会学平反，恢复重建社会学。胡乔木同志的讲话精神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哲学研究》上，评论指出，取消社会学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是错误的，用行政的手段取消一个学科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取消社会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是研究社会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的社会问题，不同的是社会问题的内容与解决的办法不一样。你不能说社会主义没有社会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问题，也就是没有矛盾，那么它就会停滞不前，不可能向前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时谈到了科学发展问题，他认为，对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要赶快补课。从那时起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然后在一些大专院校开办了社会学系。从1979年到现在有12年历史了，12年来社会学这门学科可以说基本建成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求发展了。也正如费孝通教授说的，头十年是搭戏台组织戏班子的阶段，以后就要唱大戏，从前也唱一些，唱一些农村的小戏，土台子小戏，现在搭上戏台我们就要唱大戏了。我们正处在社会的巨大的转型期，转型期内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有所作为，这是我们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搜集材料、研究社会变化和社会的组成的最好的时候，社会学有着极其光辉的前景。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改革开放为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十几年来我们已经组织起一支研究队伍并且取得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成果。经国家教委批准现在已有12所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这12所大学是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辽宁师范学院和贵州民族学院也经省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社会学系。中国社会学会已有24个分会，6299个会员。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已经达到2000多人。此外各地还成立了许多市、地、县不同层次的社会学会。其它的专门学会更多，比如社会保障社会工作者学会全国各地就有38个之多。

12年来我们取得了相当多的科研成果，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粗略地统计一下，至少有十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决策部门发生了影响或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或建议。第一就是小城镇研究，这也是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开场锣鼓，小城镇研究已经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第二是人口研究。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社会学研究所有20多个，人口研究所超过50个。第三是婚姻家庭研究。现在与社会学关系密切的杂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就是《家庭》杂志，已经超过200万份。第四是社会保障研究。第五是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第六是青少年犯罪研究。第七是关于现代化问题研究。第八是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研究。第九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第十是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有关领导部门的决策，在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小城镇的研究、人口问题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社会学界提出的一些对策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或重要内容。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及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舆论界也多次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宣传报道。

12年来社会学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指导下，走过了恢复重建的创业阶段。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学，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学，社会学在走过了创业阶段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二、关于社会学的“出身”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已经争论多年现在还在探讨的诸如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的建立问题，社会学的一般原理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的问题，等等。

王玉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创建传播一百年了，它历经沧桑，但至今对它仍有种种非议，比如通常人们所说的“出身不好”，这也是导致社会学在50年代被取缔的原因之一。社会学是世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演进中的产物，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学派，对此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至于我们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应该说“出身好得很”。中国的社会学是戊戌维新时期诞生的，最初称为“群学”，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社会学的称谓。康有为论述“群学”的宗旨为“以群为体，以变（治）为用。”可见，中国的社会学是当时走在时代前面的进步思想家创建的，它的宗旨是依靠群体力量，进行思想启蒙，推动社会前进，它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社会进步运动——戊戌维新变法的产物。中国社会学最初称为“群学”，“群”字蕴涵着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的内核。严复之所以把“社会”译作“群”字，是根据荀子的“人能群”所以能“胜物”的思想而言。在维新变法时期，“群学”一问世，就组织了“群学会”（广东）、“群萌学会”（湖南）。提倡“群人共学”“合什百亿兆人共学。”^①也就是说，依靠群体的力量，广大群众的力量，传播和发展社会学。这是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学尽管经历风风雨雨，却得以不衰的优良传统和法宝。

萧国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在中国已经存在一百年了，西方社会学的历史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最近流传着一些对社会学的议论，有人说社会学是搞“动乱”的，搞社会学的人写文章认为社会学是搞“稳定”的，似乎两方面都有道理，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主要是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去利用它都可以对社会起到不同的作用。认为社会学是搞“动乱”的或者说是搞资产阶级的往往就是把社会学的老祖宗说成是孔德。我认为，要改变社会学的“出身”，社会学的创始人应该是马克思而不是孔德。孔德提出了社会学这个名词，但真正对社会学的发展起着影响的我认为还是马克思。

西方社会学界对马克思是有偏见的，他们往往把“冲突理论”说成是马克思的创见，韦伯就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的兴趣是偏重于经济结构方面，但是他并没有忽视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基督教的新教包括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再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现在讲到的西方当代社会学的几个流派，我认为，这些流派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大都存在着思想萌芽。比如：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就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讲过，社会经济是由各种要素所组成的，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就表现出它的功能。我认为这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萌芽。至于“冲突理论”就更不用说了，西方社会学界也认为其创始人是马克思。再比如“互动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里就论述过社会交往问题，讲人与人之间相互行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交换、分工等也可以说是“交换理论”的萌芽。综上所述，尽管孔德被西方社会学界称为“社会学之父”，但真正在社会学发展上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是马克思，说马克思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并不为过。

^① 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72页。

托马斯·库恩对于科学的范式有过论述，他认为，科学的范式对于科学的发展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带动一批科学家去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范式的含义比较广，但是必须有一个或若干研究成果的范例居于其中。马克思对社会学的研究确实有他的范例，第一个范例就是《资本论》，人们都认为《资本论》是经济学著作，我认为它是社会学著作，至少是经济社会学著作。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资源是短缺的”这是看到了“物”；“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是看到了人。欲望无限的人面对有限的资源该如何利用资源。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仅是讲人与物的关系，更主要的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资本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把《资本论》看作是社会学著作则是无可非议的。再比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记》，我认为就是政治社会学著作。《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也是这样。晚年的马克思将其精力转向了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与社会学更加接近的学科。有人将马克思的一生割裂开来，说他研究《资本论》时是研究经济的，后来又转向了文化人类学研究。我认为，这里没有很大的鸿沟，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趋势。

对于社会学的发展，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当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成为一个很严密的体系，但是基本的思想观点基本范畴已经形成了。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方面，马克思有比孔德更加高明之处。孔德是将现成的自然科学方法照搬到社会学研究中，马克思则说，要注意人类史和自然史两者的区别，因为人类史是有意志的。所以马克思说研究经济学不能用显微镜不能用化学试剂，要用科学的抽象力。用科学的抽象力的观点对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西方社会学界为什么要把社会学创始人说成是孔德呢？其目的是利用社会学去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去改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运用社会学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我认为，今后社会学的发展可以完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完全可以运用于当前的现代化建设。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学，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着社会学。

岳颂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社会部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帮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搞政策咨询决策的机构，一些社会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要求我们去回答去解释。尽管这些问题不完全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但是社会科学、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应该承担起指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我们目前面临的进退两难的问题相当多，我想到了十个方面的课题要求我们去解决。比如，人口问题，人口素质问题。现在我们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机关团体的人口再生产都是可控制的。可是那些边远农村呢，就难以控制了，超生多生这种现象在那里很普遍。我们现在有控制的是素质比较高的这部分人，结果这部分人的子女越来越少，而那一部分失控的人却拼命在生。能不能拿出可操作的办法解决逆向选择或者叫作恶化选择的问题？再比如，我们今天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追溯起来，我们五十年代批了马寅初先生，错批一人，超生三亿。社会学学者很早就注意了人口问题，向整个社会提出了警告。我们对马寅初的批判对先知先觉者的批判，也是我们民族素质不高的表现，正是民族素质不高导致了对人口忧患意识的缺乏。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接着就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我们是在经济不很发达的情况下面临了“白发浪潮”，这又是一个难题。再如，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如果说大城市对环境的污染是在点上开花的话，乡镇企业则是“遍地开花”，乡镇企业现在已经成了气候，难道能把

乡镇企业都停下来先去搞环境治理吗？这又不现实，又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还有教育问题。现在大家都在呼吁。我们一方面花钱搞教育，一方面教育出来的人哗哗往外流，特别是有些专业技术人才、艺术人才。采取什么办法去解决？什么交钱，几年服务期，都是治标不治本。关键问题出在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上，再加上我们国家经济上先天的差距，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住宅建设问题，在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衣食住行中，现在住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小康生活指标，小康生活的标准怎么界定？上海市到本世纪末还消灭不了马桶，到下个世纪上海人还要使用马桶，你能说它是小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住宅的高层化和人际关系的疏远问题。家庭结构逐渐向核心家庭发展，“空巢家庭”越来越多，对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如何解决？有人把将来的家庭形象地说成“四二一”，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个，一对夫妻加一个孩子，还有人说是“五二一”，孩子还要在单位供养一位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的培养问题越来越重要。社会保障问题也很重要，搞社会保障就得花钱，我们现在财力不足，又有赤字。农村社会保障不能全面铺开，二千个县中搞社会保障试点只有一百个，中央才批准了二十个县，全面铺开难度很大，不全面铺开，农村没有社会保障，独生子女政策就贯彻不下去，养儿防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城市里也是如此，如果社会保障得不到解决，产业政策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没法搞企业关停并转，没法让企业“生老病死”。还有我们的资源破坏问题，我们现在经济效益不高，主要靠加大投入来增加产出，是一种资源浪费型的扩大再生产，而我们又是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再有，我们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大，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又要影响社会的安定。经济与社会发展又可能出现矛盾。

以上我简单地讲了十个方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的回答与解决。这也是整个民族对我们提出的课题，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向社会学提出的挑战。

陈良瑾（民政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近年来发展很快，但是也还存在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许多课题有待于社会学参与解决，社会学可以作为多种学科综合研究的骨干学科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农村基层的社会保障大多数形成了体系，并且在比较富裕的乡村开始试点养老保险。民政部已经批准50个县作为第一批试点，很快就要发展到一百个县，在全县范围内搞养老保险。这些县人均年收入在800元以上。原来农村实行的是大锅饭式的保险，责任制实行后这种保险制度就解体了，于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按照传统的作法，五保户怎么解决？优抚对象、灾民怎么救济？没有形成能够自我调节从县一级开始至乡村间的一个管理保障体系。这个保障体系应该是以乡、村为依托，乡可以进行部分统筹，县可以进行调节。

从历史上看农民都是家庭养老保险，农民有意见，但是国家又不能全包下来，每年都有大约2亿人受灾，成灾地区人口1.2亿，得到部分救济的只有0.5—0.6亿，占受灾人口三分之一。而救济款项也就是10个亿，1991年多些，达到30多个亿，因为发生了特大洪水，造成8000亿元损失。10个亿分散开，一人只有一二十块钱。所以光靠国家这点救济是不行的，钱就这么点，农村的社会保障怎么办？现在一些发达起来的农村就是学城市，一搞就是十几个不要钱，什么都包起来。我说，你们这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下去要走弯路的，不要照搬城市的这套东西，城市的这套保障实际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以低工资高补贴为特征的通过预先扣除进行再分配的国家负责体制，使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1990年国家财政补贴已经突破一千亿大关，还不包括住房补贴。如果按照“大口径”计算，补贴已经达到11.6%，已经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日本才15%，苏联只有10%，我们超过了苏联，城市人口才1.5亿，花了一千亿保了1.5亿。弊端已经很明显，价格信号失真，改革空间缩小，个人依赖性增强，消费结构失衡，已经运行不动了。近年来，我们的一些方面超前得很，一些方面又滞后得厉害。这和我们城市包揽的福利制度有关。比如，拉萨市的彩电普及率已经达到88.5%，超过了法国的平均水平，全国城镇彩电普及率是59%，连黑白电视加上达111%。吃的方面，每天热量摄入量达2500—2700大卡，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有些方面又落后得很，像大学生入学率只有2%，比印度还落后，印度1965年就达到了5%。

城市社会保障要改革，个人要尽责任，资金结构应该是多方面的，体制上要有个统管的部门，覆盖面还要扩大。农村要走自助型为主的保障道路，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在一定的時候还要以家庭保障为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提高标准。

有几个观念需要转变，第一，我们不能把保障帮助的对象仅仅当作帮助对象，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种资源和能动的主体，要发挥他们的潜能，就是要助人自助，是帮助你让你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代替你去解决你的问题；第二，不能把福利全部包下来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包得越多越糟糕，世界各国越是包得多的越困难，中国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陷入了困境；第三，社会保障不仅仅是政府和国家的责任，也是个人的责任，个人也是责任主体。走出一条社会福利路子，使福利制度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互动，而不是福利提高以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或者离开了经济发展去搞福利制度的变动。要建立一个模型，就是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福利应该增长多少才是比较合适的。福利增长多了就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少了也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什么是一个最佳的互动模型。量化了以后可能成为宏观决策的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现在有关部门谁也说不清，只知道国民收入每增加十块，社会保障增加一块，谁也说不清是多了还是少了，合适还是不合适。资源配置与再分配二者间的互动模型也是需要研究的。

总之，社会学要面对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的未来。社会学工作者要深入实际，在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代里做出我们的贡献。

四、社会学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在实践中构筑完备的理论体系。

孙立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理论教研室主任）：我认为，无论从国外看还是从国内看，社会学目前还有着很强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面对比较宏观的比较重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革，它缺乏一种能够对比较宏观的现象作出反映充当一门综合学科对其进行研究的能力。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五周年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存在明显的轻宏观重微观遇到问题绕着走的现象，这是和这门学科本身具有的力量有直接关系的。第二，社会学还缺乏一种与其它学科进行对话的能力。我们翻开社会学的著作就可以看到大量引用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与观点的现象，而政治学、经济学著作就很少引用社会学的理论与观点，也就是引用韦伯、帕森斯等少数社会学家的著作。从现实来说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社会学同政治学、经济学的对话能力特别差。比如回顾十年改革，社会学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映最基本的概貌的能力就比较差。第三，社会学缺乏一种自身的知识的积累性。恢复重建十年了，断断续续几十年了，已经有的经验研究明显的缺少可积累性。而其它学科，一个时期与另外一个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别，后一个时期很明显地建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两种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如果不能从整个学科的发展上给予充分的注意和重视，不能够解决这一时期出现的重大问题，将来我们面对着新的十

年、一百年，怎么能说和前十年前一百年相比，社会学有了一个明显的长进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原因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实比较特殊，和经济学、政治学确实有所不同。我在讲“社会学概论”时最难讲的就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比较庞杂，理论不完备，最基本的范畴说不清。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十年中有几件事情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社会学应该有勇气面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革，除了微观的经验积累之外，社会学应当形成最基本的作为一个学科能够贯下来能够具有横向穿透力的基本范畴。最近，我们初步设想，从社会结构这个概念深化下去，从这里搞下去很可能在将来会搞出一些成果。其次，对于国外社会学界最新的发展情况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是从引进西方社会学开始的。这几年我们对西方社会学的介绍好像就截止到了70年代初期中期这一段，从“结构功能主义”等四大理论之后好像只见到了“现象学”、“信息论”、“本土方法学”。对于西方社会学最近这几年的新的发展或带有方向性的发展势头重视是不够的。前一段有人搞了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可以说是很有意义。我觉得，目前西方社会学有三个内容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三个内容对于形成刚才我所说的设想中的那种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比较历史研究，西方社会学界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了，而且确实搞出的成果比较多，它带有很强的宏观性，因为一种宏观的理论的建造最基本的灵感来源于两个，一个是现实，一个是历史。二者比较，历史的可利用性要更强一些，历史的资料有很强的确定性，关系也比较确定；现实的虽然也能提供灵感，但是材料比较零乱，难以把握。通过历史的研究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的形成很有好处。第二个内容是社会政治分析，它分析的东西带有社会和政治交叉的这样一种特征，对于我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很有启发。第三个内容是对于发展和现代化的研究。面对中国的社会变革、面对国外社会学的新的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学才能在今后取得长足的进步。

王跃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社会学宏观研究不足具体问题研究比较多的状况，影响了学科建设，影响了理论的构筑，同时也影响了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度。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之一是把社会史的研究与当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当代的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历史上社会问题的延续，如果能通过对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深化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一些社会问题是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学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再有，从理论上加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可以促进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过去我们对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介绍得多，而对于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努力不够，这种情况除了与社会学处于初创阶段有关之外，还与社会学学者的素质与需要存在差距、一些社会学研究人员知识面不宽有关。因此加强理论建设加强队伍素质提高工作，对于社会学事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熊振南（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副司长）：社会学恢复重建12年了，社会统计的发展与社会学的进步密切相联，这个密切相联本身就说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指导。中国社会学曾经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磨难。我是这么想的，当一个社会处于黑暗处于绝症状况，除了革命不能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可能那些科学研究很难有用武之地，当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光明没有什么社会问题的时候，科学研究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吧。建国后曾经出现过的那么一个波折作为历史已经不会重现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社会学应该得到一个广泛的深入的发展。

社会学应该加强宏观综合研究。从近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就经济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经济的宏观失控，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这一突出问题。就整个社会发展来说也同样存在类

似的问题。表现之一是部门的利益与局限影响着我们对社会状况与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宏观的综合研究来说就势必产生一些偏误。讲教育问题时他可以把教育说成是最重要的，重要到其它什么都别说的程度，可以撇开基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在讲别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这么说。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从对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说，最后要归结到一个实际操作上来，这就需要我们真正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加强宏观综合研究。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使加强宏观综合研究显得更加重要。

社会学应该加强宏观的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从统计的角度说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它是把已有的社会现象的数量表现记录下来。我觉得现在社会统计上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数据全出来了，我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很难界定它，很难评价它。这个量究竟是否适度，是过快还是过慢？这样的结构是比较合适还是比例失调？在经济上目前已经形成了很多根据一些模型形成的概念，可以根据一些量的变化发出示警，根据这些来对整个经济运行情况作出判断，从而通过这些量为其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统计上，本身就有好多指标属于中性的，就不太容易说清这个指标是低了好，还是高了好。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社会学来说，如果能够走在前面，改变统计的这种滞后性，那么就可以利用已有的记录过去的量来推断未来，为今后决策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社会统计近十年虽然有了一些发展，但总体上来说还是薄弱的，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定量的信息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社会方面还是比较薄弱。要改变这种状况难度很大，因为目前的社会统计资料汇集工作是在过去部门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取得的。现在许多社会统计资料不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反映整个状况，而是局限在部门内部。同时由于形成了各个部门内部的统计资料，社会统计又被架空了。近几年我们一直在琢磨如何加强社会统计的综合研究能力，但是突破不大，因为各个“块”的具体问题都由有关的管理部门来研究说明了，劳动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各“块”都有部门在研究。那么，作为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什么呢？社会统计学要反映社会发展立足于哪里呢？我们必须加强宏观的综合的研究。如果不能通过我们已经获得的量来对社会发展失调或适度、过快或过慢作出回答，社会统计学、社会学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近年来，我们和社会学方面的同志合作做了些研究尝试，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搞了一个我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方案，共计10个方面130个指标。为什么要搞一套社会评价指标？因为经济指标是硬的，社会统计本身没有这样的硬指标，造成了改变过去那种重经济轻社会的状况十分困难。我们想通过这一方式触动一下各级各方面，加强对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重视。社会学在加强宏观综合研究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只有加强宏观综合研究社会学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常永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社会学要在较短的时间得到长足的发展，应该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方面入手，抓理论建设、抓实证研究。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实证研究也处于一种比较分散的状态。一个有效的途径是从实证研究入手，积累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些理论升华之后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从宏观上讲，社会学界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制订出一个规范化的体系，中国社会学应该研究哪些方面的题目，具体还可以细划，大题目中题目小题目，做到心中有数。

岳颂东：如何加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把社会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的尖锐武器。我想到十个方面：一是更加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

要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真正干预社会,介入社会,解决实际问题;二是要把社会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建树和完善起来,我们要进一步合作,发挥集团优势,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三是一定要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影响我们国家的宏观决策。社会学的专家学者的研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更是为了改造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是个权力比较集中的国家,影响宏观决策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四是社会学应该加强定量研究。我想,现在有数量经济学,能不能建立数量社会学,至少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五是要大量地把国外最新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介绍进来;六是广泛宣传普及社会学,形成社会学繁荣的社会基础;七是社会学学者应该直接参与社会的建设与改造,把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社会实践,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八是社会学研究的几个方面军应该进一步联合起来,不要变成散兵游勇,而要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相互互补,相互叠加优势,共同促进社会学的发展;九是要集中力量抓“拳头产品”;十是社会学学者在当今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阶段一定要避免金钱的诱惑,潜心研究,为社会学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庆基同志就社会学研究队伍的状况及社会学学科发展前景作了发言,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队伍政治状况的肯定评价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的陈应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的董之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李银河等人也先后就老年问题和中国社会学百年史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等方面作了发言。

(王 颖)

书 讯

△《社会学——中高级读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主编陆学艺、副主编苏国勋。该书计15章,阐明了社会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论述了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现代化、社会秩序和社会张力、社会问题和社会控制、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等。此书为大32开,封面压膜,50万字,定价7.90元。

△《观察社会的视角——社区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颖、方明著。该书系统地阐述了社区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流派,探讨了中国城乡社区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分析了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影响社区生活的各种因素等。该书是在《城乡社区研究》(社会学函大教材)一书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首次作为正式出版物出版。全书26万字,340页,封面压膜,大32开,定价4.90元。

以上两书均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国情丛书编辑部发行组发行。邮政编码:100037。邮购图书另加邮挂费10%。